

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

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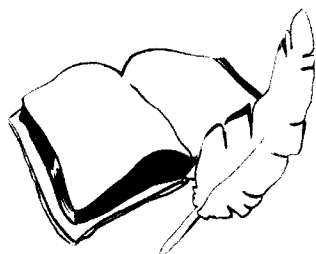
国际敦煌学丛书

王冀青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M. Aurel Stein



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

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考古档案日本敦煌学史文献研究

王冀青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王冀青著.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4

ISBN 7-5423-0944-7

I. 斯... II. 王... III. 敦煌学—研究
IV. 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6174 号

责任编辑: 白玉岱

封面设计: 徐晋林

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

王冀青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2.75 字数 450 千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00

ISBN 7-5423-0944-7 定价: 5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作者简介

王冀青, 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言

这本书取名《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顾名思义，书中的主角是英国印度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1862—1943年），书中的布景是日本敦煌学。

斯坦因是英藏敦煌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国际敦煌学的开拓人之一。他于1900年至1901年进行了第一次中亚考察，于1906年至1908年进行了第二次中亚考察，于1913年至1916年进行了第三次中亚考察，于1930年至1931年进行了第四次中亚考察。斯坦因在其历次中亚考察期间，获得过数量不等的中国西北文物，尤其是他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于1907年从中国甘肃敦煌获得的大量藏经洞出土文物，构成了国际敦煌学研究最重要的一批资料，奠定了国际敦煌学的基础。斯坦因有关中亚考察的全部论著，

一直是国际敦煌学的经典著作。斯坦因虽然也称东方学家，但他早年专攻印度学，后来逐渐将研究范围扩展，不过并没有扩及汉学和日本学领域。因此，斯坦因本来是很难和日本学术界发生联系的。只是因印度学而产生的中亚考察活动，以及因中亚考察活动而产生的敦煌学，才成为斯坦因和日本学术界发生联系的主要媒介，才将斯坦因和日本敦煌学联系到了一起。

日本敦煌学在国际敦煌学领域内独树一帜，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代表着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并深刻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敦煌学研究进程。众所周知，日本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因此，当斯坦因等近代西方考古学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发掘出大批与日本文化渊源有关的中国古代文物之后，尤其是当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先后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物劫往欧洲之后，日本的学术、宗教、文化界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便快速兴起。日本的广义敦煌学（大致相当于前伊斯兰教时期中亚考古学）开始于1902年，这年大谷光瑞在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的影响下发起了自己的第一次中亚考察。日本的狭义敦煌学（关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物的研究）开始于1909年，这年日本人最初了解到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物。从此以后，日本人以一种特别的热情从事着敦煌学的研究，以至于在1925年前就创造出“敦煌学”这一词汇。

无论是斯坦因研究，还是日本敦煌学史研究，都可以称得上是国际敦煌学史研究中最重要课题。无论从斯坦因研究的角度看，还是从日本敦煌学史研究的角度看，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之间的关系肯定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新领域。无论是对于斯坦因的研究也好，还是对于日本敦煌学史的研究也好，又都是我从很早以前起就满怀兴趣的研究课题。只是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我到现在也没有能正式完成这两个课题中的任何一个。现在，我却先写出《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这么一本不伦不类的书来，可以算是一种没有循规蹈矩的“无心插柳”行为，或者说是我在从事上述两个课题研究过程中不经意间得出的副产品，也可以说是两个课题在偶尔相交后产生的一个怪胎。但

是不管怎么说，我在写完这本书后还是感到很高兴，临出版时总觉得应该再简单写点什么，于是想在这篇“前言”中交代一下这本书的写作过程。

我对斯坦因这个人的兴趣由来已久，从1979年便开始搜集、翻译斯坦因著作。后来在搜集斯坦因研究资料的过程中，我也看到过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斯坦因和斯坦因搜集品的一些论著，但早年的意识中并没有把斯坦因和日本敦煌学联系在一起。到1988年3月，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研究员土肥义和先生来兰州大学访问，第一次让我把斯坦因与日本人联系在了一起。土肥义和先生是日本著名敦煌学家，也是日本研究英藏斯坦因搜集品的专家。在我们座谈的过程中，土肥义和先生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在英国调查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献的成果，使我对日本学术界研究英藏斯坦因搜集品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当时我正痴迷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的研究，于是我也和土肥义和先生还谈论了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这个话题，我的研究兴趣得到了土肥义和先生的鼓励。

土肥义和先生返回日本后，把我的情况介绍给日本的斯坦因研究专家、东洋文库理事长榎一雄教授，并建议我到东洋文库留学。众所周知，东洋文库是国际东方学研究的专业图书馆，设有规模庞大的研究部，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也附置于东洋文库内。在东洋文库的书库里收藏着有关亚洲各国的几乎全部西文、日文、汉文图书与杂志，其中包括与中亚考察史、中国西北考古史及敦煌学有关的各种语文出版物和照片资料，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内容之丰富，集中程度之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无与伦比的。由于敦煌学研究在东洋文库向来占有极为显著的地位，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洋文库也被公认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土肥义和先生建议我到东洋文库留学，对我来说是一个了解日本敦煌学、向日本学者学习先进研究方法的大好机会。在榎一雄先生的支持下，土肥义和先生于1988年9月28日第一次为我申请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招聘研究员基金。同样在榎一雄先生支持下，东洋文库还于1988年11月15日为我申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特定地域研究者特别研究

员基金。但是，当年的这两项申请都没有获得批准。

1989年初，我应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Oriental Collections, The British Library）的邀请，赴英国伦敦从事研究工作。我这次赴英国的任务，是参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与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等机构联合进行的“英藏敦煌文献”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主要是协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宁可教授，整理英藏斯坦因所获敦煌中亚出土汉文文书的未刊残片部分。参加项目工作之余，我还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大英博物院档案部（The British Museum Archives）等机构开始从事我的个人项目，即调查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英文档案。我整理、研究英国藏斯坦因考古档案的工作，便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在我调查斯坦因档案的过程中，也看到过一些与日本敦煌学有关的资料，但我当时的主要兴趣还是斯坦因的第四次中亚考察。我本来打算在英国逗留更长一段时间，以便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全面调查研究斯坦因考古档案，但当年国内的风波扰乱了我的研究计划，促使我在1989年年底回国。

在这段时间里，榎一雄先生和土肥义和先生仍继续在日本为我寻找留学资助。1989年9月29日，土肥义和先生第二次为我申请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招聘研究员基金。但就在提交申请书后不久，榎一雄先生便不幸于1989年11月5日因突发虚血性心力衰竭而病逝，这次申请也没有获得批准。1990年9月21日，土肥义和先生在新任东洋文库理事长北村甫教授的支持下，第三次为我申请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招聘研究员基金，终于申请成功。1990年12月28日，日本学术振兴会理事长大崎仁先生给我发出了邀请信。从1991年6月起，我在日本学术振兴会的招聘和资助下，赴日本东京任财团法人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在东洋文库研究部敦煌文献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

东洋文库研究员或外国人研究员有个特权，那就是可以自由地进出东洋文库的书库，随意翻检自己所需要的图书资料，然后拿到自己的研究室中仔细研究，这对研究资料的搜集工作来说是非常有利

的。我在日本工作的一年时间里，除了在筑波大学短期集训了一个月的日语之外，一年四季里的几乎所有工作日都在东洋文库的书库和研究室里度过。我在东洋文库的主要研究任务，是在土肥义和先生的指导下，从事一项题为“敦煌及东突厥斯坦（新疆）出土文献的综合研究”的合作研究项目。根据1990年9月21日提交给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申请书所列，我和土肥义和先生的合作研究工作主要包括4个子课题：“（1）回顾近30年间日本、中国两国有关敦煌及东突厥斯坦（新疆）史研究的动向、课题以及研究展望；（2）合作研究敦煌周边诸民族和汉族、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史；（3）再探讨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黄文弼等各支探险队所搜集资料的出土地点和出土年代；（4）编制敦煌及东突厥斯坦（新疆）出土文献资料的综合目录”。在这4项子课题中，我承担第1项和第3项，土肥义和先生承担第2项和第4项。换一句话说，我要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的研究，主要属于中亚考察史、中国西北考古学史和国际敦煌学史的范围。但是由于时间有限，我主要围绕第3个子课题进行工作，将东洋文库所藏中亚考察史、中国西北考古史和国际敦煌学史方面的各种语文图书、杂志翻检了一遍。

关于我在东洋文库的研究结果，我曾经给日本学术振兴会提交过一份详细的英文报告书，但是因为字数太多，在这里不便引述。土肥义和先生于1992年6月24日提交给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研究经过报告书”中倒是归纳得很简单，他的原话是：“关于王冀青氏取得的研究成果，正如他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书（另印）中所说明的那样，主要是在东洋文库以课题3为中心进行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特别局限于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黄文弼等人的探险队了，而是涉及来自英国、俄国、法国、德国、瑞典、瑞士、芬兰、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的所有中央亚细亚探险队，时间范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直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王冀青对所有中央亚细亚探险队的调查报告书和报告报道之类的东西（即刊登在数十种东方学杂志上的那些东西）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分析，对各探险队发现或搜集到的文物之出土地点、发现年代、内容等逐一进行了分类整理。王冀青在东洋

文库工作了 11 个月时间，写成了与上述研究调查有关的草稿，多大约 50 万汉字（即用每页 400 字的稿纸写了大约 1250 页）。在不久的将来，这部书稿大概会以《中央亚细亚出土文物的发现与研究史》（暂定名）为名在中国出版吧。”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能像土肥义和先生所期望的那样，把在东洋文库时草成的那部书稿付诸出版，没有在中国出版一本称《中央亚细亚出土文物的发现与研究史》或类似题目的著作。但是，我在东洋文库草成的书稿后来分化成一系列更具体、更细小的研究课题，也将会通过眼下这套“国际敦煌学丛书”而发扬光大。后来我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主讲《国际敦煌学》、《中亚科学考察史》、《中亚考古学》、《敦煌学概论》、《国际敦煌学史》、《国际汉学源流》等课程时，讲义的相关部分也是以东洋文库时所草成的书稿为基础的。

我既然在日本研究中亚考察史、中国西北考古史和国际敦煌学史，当然要格外关注以大谷光瑞考察队为代表的日本中亚考察活动，还要通检明治末年以来日本学者用日文写的敦煌学论著，因为在东洋文库里收藏的相关日文图书杂志肯定是全世界最齐全的。我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有意识地扩大了范围，将日本敦煌学史的材料也包括在内，将有关日文文献资料翻阅一遍，对其中的重要部分做了抄录、复制。应该说，我对日本敦煌学史真正产生兴趣，而且还为此搜集有关的日文资料，是从 1991 年开始的，是从东洋文库开始的。但是，即便我是在日本从事研究，尽管我已经对日本敦煌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惯性作用，我的研究重心始终还是在斯坦因身上。就在我即将离开日本的时候，东洋文库于 1992 年 6 月 23 日为我举办了一次特别讲演会，实际上是我的研究成果汇报会。在土肥义和先生的建议下，我的讲演题目确定为“斯坦因氏第四次中央亚细亚探险（1930—1931 年）之研究”。选这个题目也反映出，我在日本期间最后也没有离开斯坦因研究这个老课题。

1992 年 7 月我从日本回国以后，对日本敦煌学史的兴趣与日俱增，并开笔撰写一部暂题为《日本敦煌学史》的书。为了写这本书的目的，我于 1993 年申请到兰州大学笹川良一优秀青年教育基金会青

年教师资助项目，项目名称是“中国敦煌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其实就是日本敦煌学史。但是，由于斯坦因研究课题的拖累，我后来关于日本敦煌学史的研究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也在1993年，我先后承担了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资助项目“近现代欧洲、北美、日本考察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科学考察史”和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八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西欧、北美、日本散藏的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来华考察档案的辑录与研究”。虽然在研究中亚考察史和斯坦因档案时理所应当地把日本也扯了进来，但我的主要精力还是不得不放在英国藏斯坦因中亚考察档案的辑录与研究方面。1993年4月至1994年2月，土肥义和先生在兰州大学讲学10个月，我又有机会向先生请教日本敦煌学史和斯坦因研究中的许多问题。

1995年初，我获得英国科学院王宽诚研究员基金（The British Academy K. C. Wong Fellowship）的资助，以“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第四次中亚考察研究”（A Study of Sir Aurel Stein's Fourt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为研究课题，第二次赴英国从事研究工作。我这次在英国工作期间，主要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博物院、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等机构调查、研究斯坦因档案。在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工作期间，我将斯坦因手稿第1—458号从头到尾查阅了一遍。我这次在英国一共过目斯坦因档案近10万页，通过抄录、复制、摄影等手段获得了其中最重要的近3万页。我在牛津大学查阅斯坦因档案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了一些与日本以及日本敦煌学有关的资料，其中包括斯坦因和一些日本敦煌学家之间的往来通信、斯坦因撰写的日本旅行日记和日本游记等。由于我已经对日本敦煌学有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斯坦因档案中的这些资料很快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认为它们既是斯坦因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日本敦煌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于是便将它们全部抄录或复制下来。本书中所用的大部分原始档案，便是当年我在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的斯坦因手稿中发现的资料。

我于1995年秋季回国之后，除了教学本职工作之外，除了开会、出差、出国等公差之外，将绝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费在对牛津大学包

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的整理、翻译、考释、研究工作上。这项工作的进度极为缓慢，但我在此期间也偶尔腾出一些时间来，捡拾点资料，零星发表点东西，其中有些与日本敦煌学史有关。

199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日本东海日中科学技术交流协会、爱知县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中日新闻社等机构为了纪念，于当年7月在名古屋市中日新闻本社大厅举办“日中国交正常化25周年纪念·丝绸之路讲演会”，邀请我和早稻田大学教授长泽和俊先生担任主讲。我按照主办方确定的题目，做了题为“丝绸之路·敦煌的历史和新发现”的讲演。我在讲稿第5部分“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和敦煌学的鼻祖斯坦因氏档案的新发现”中，介绍了本人对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的整理翻译成果，也介绍了斯坦因档案中保存的一些有关日本的材料。可惜的是，当时由于时间、语言等原因，我的讲演无法展开来谈，我的“新发现”也没有得到充分展示的机会。

2000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邀请我参加在香港大学召开的“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提交了一篇题为《“敦煌学”一词源流考辨》的论文，并于2000年7月26日上午在大会上宣读。众所周知，关于“敦煌学”一词的起源，中国学术界以前异口同声认定，该词系中国敦煌学家陈寅恪先生于1930年首创。我于1991年在东洋文库调查日本敦煌学史文献时，从书库中找到了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先生于1925年12月在大阪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敦煌石室の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大阪：植田政藏印刷所，1925年12月18日发行，非卖品），其中15次出现“敦煌学”一词，从而否定了“敦煌学”一词系陈寅恪先生首创的通行观点。但要谈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在文章中对早期日本敦煌学史做个全面的考察。我的论文在香港大学宣读后，与会的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席姚德怀教授随即在他的词源学札记《语文散记》中以“敦煌学”为题，对我的论文及主要观点予以介绍评论，发表在2000年7月出版的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机关杂志《语文建设通讯》第65期上。姚德怀教授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说：“王冀青谦称自己的论文为‘不成熟的小文’。其实这篇论文还详细叙述

了1909—1925年日本敦煌学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这篇25页长的文章一读。”鉴于读者难以找到论文打印件，我很快将论文的主要部分以《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为题，发表在《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上。

2001年，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举办的“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论文《高楠顺次郎与敦煌佛典——牛津大学藏斯坦因与高楠顺次郎往来通信研究》，刊布了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中保存的斯坦因与高楠顺次郎之间的几封往来通信。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兰州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7月出版的《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中。

早在1989年12月，甘肃教育出版社曾出版过陆庆夫、郭锋和我合写的《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由陆庆夫承担第一卷“中国的敦煌学家”，郭锋承担第二卷“日本的敦煌学家”，我承担第三卷“欧美各国的敦煌学家”。我选写的是斯坦因等7个欧美人物，表明那时我对日本敦煌学家的兴趣小于欧美敦煌学家。到了2002年12月，甘肃教育出版社再版该书，改书名为《中外敦煌学家评传》，我除了负责增补第三卷外，还为第二卷“日本的敦煌学家”补写了《狩野直喜》、《泷精一》、《矢吹庆辉》、《滨田耕作》等4篇传记，实际上都是快速地从我的《日本敦煌学史》草稿中抽编而成的。但由于新版书中的每篇传记也都有字数限制，所以我关于这4位日本敦煌学家的传记也只能是泛泛而谈，没有空间展示我所掌握的全部资料，更不可能涉及斯坦因档案中与他们有关的具体资料。

其实那时我正在整理、研究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手稿中保存的斯坦因与矢吹庆辉之间的14封往来通信，所以对矢吹庆辉这个人特别感兴趣。鉴于《中外敦煌学家评传》中所收《矢吹庆辉》一文中根本没有篇幅提及斯坦因与矢吹庆辉之间的往来通信，我又以斯坦因与矢吹庆辉之间的这批往来通信为基础，写了一篇题为《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与矢吹庆辉往来通信调查报告》的文章，发表在《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上。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虽然是对《矢吹庆辉》一文做补充，但仍然感觉到篇幅的限制，所以文

中也只能罗列信件顺序，介绍信件大意，而没有能刊布信文。2003年9月，为纪念中国敦煌学家王重民先生诞辰100周年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20周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北京联合举办“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我在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矢吹庆辉与英藏敦煌文献摄影》的文章，主要利用英藏档案文献，详细介绍矢吹庆辉拍摄英藏敦煌文献照片的经过，其中公布了一部分信文。这篇文章的全文，刊登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于2003年9月编印的《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会议手册》中。

2003年是榎一雄先生诞辰90周年，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榎一雄与英藏敦煌文献摄影——纪念榎一雄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暨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摄影五十周年》。这篇文章回顾了榎一雄先生和东洋文库在战后拍摄英藏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的经过，但涉及的是日本敦煌学的新阶段。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2期上。

总的说来，到了2003年时，我已经将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手稿中有关日本敦煌学史的资料全部整理、翻译完毕，已经为《日本敦煌学史》一书写完了早期部分（明治末年至大正时期），也已经发表了一些有关日本敦煌学家的文章。于是，我在这时突发奇想，产生了写《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这本书的念头。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原本只是希望能通过一个足够大的空间，将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手稿中与日本敦煌学史有关的资料集中起来公布于世。所以我在正书名下还加了个副标题，题为“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考古档案日本敦煌学史文献研究”。但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是，在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手稿中，与日本敦煌学史有关的资料很分散，主要是斯坦因与几位日本敦煌学家之间的往来通信，还有斯坦因在日本旅行时写下的旅行日记和游记之类，分藏在各个部分和编号中。而且这类档案资料的数量也不多，并不能够自成体系。为了能将零星、散落、互无联系的档案资料串联起来，使它们的史料价值显现出来，我必须把这些资料放置到斯坦因生平和日本敦煌学史这两个背景较为广阔的平台上去。于是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不得不同时

涉及斯坦因的学术活动和日本敦煌学史的发展脉络，不得不借用许多斯坦因生平中与日本敦煌学史有关或无关的已知事实，以及日本敦煌学史上与斯坦因有关或无关的已知事实，来衬托本书副标题中点出的主题，来形成本书所刊布档案资料的背景，来填补一件件档案资料之间留下的大片空白。这种做法有点像考古学上的文物复原，在根据陶瓷器残片或骨骼残片复原文物的原形时，在残片太少的情况下，有时需要用石膏将残片粘结起来，并塑造出原物的形状来。文物残片固然可贵，但粘结残片用的石膏也必不可少。因此，读者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当看到许多小节里并没有出现档案资料的影子时，请不必惊讶，因为这些部分只是为了说明其他小节中所用档案资料而不得不提供的陪衬部分。

2003年，甘肃教育出版社正式决定出版“国际敦煌学丛书”，我给出版社交去的第一部书稿，便是这部《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本着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我写这本书时没有采用章节体，而只是简单地列了42个小标题，尽量地按照斯坦因生平的时间顺序排列，以斯坦因的生与死为全书的起首和结尾。这种方法有个好处，即将来若发现任何有关新材料时，都可以随时添加补充进去。出版本书的目的之一，是为国内的研究者提供难以看到的外文资料，因此对于所涉及资料，无论是档案资料还是文献资料，无论是英语文献还是日语文献，我在翻译和排列时都尽可能完整地全部翻译成汉文，以引文的形式保留原貌。这样一来，就使得本书的某些部分显得冗长烦琐。本书所用档案材料的出处，以及卷宗号和页码，都在引文后以注释的形式标明，这里就不再归纳总结了。本书最后还有3个附录。附录一“斯坦因日本旅行日记释注稿”和附录二“斯坦因日本游记释注稿”全部和斯坦因1930年在日本的访问有关，都是可单独成篇的部分，因为正文中无法摆放而只得放在书后刊布。附录三“斯坦因访问日本期间的行程一览表”是我根据斯坦因日本旅行日记和斯坦因日本游记整理出来的斯坦因访日期间每日行程表。

其实，要想搞清楚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之间的关系，仅靠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的一点英文资料是远远不够的，我还将继续寻找新

的资料。在这里应该补充的一点是,从1999年到2002年,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Library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和大英博物院两单位合作整理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其间又发现了一些斯坦因和日本人之间的往来通信。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于2002年出版了由匈牙利学者埃娃·阿波尔(Éva Apor)和英国学者汪海岚(Helen Wang)主编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收藏品目录》(*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s of Sir Aurel Stein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一书,其中包括由匈牙利学者阿格尼斯·克勒兹塞尼(Ágnes Kelecsényi)和阿格尼斯·喀尔特兹(Ágnes Kárteszi)合编的《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有关的通信、手稿、文件和书评目录》(*Catalogue of Correspondence, Manuscripts, Documents and Reviews Relating to Sir Aurel Stein*),这个目录中著录了这批资料。可惜的是,关于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保存的这批斯坦因与日本人之间的往来通信,我还没有机会加以调查和研究。除了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和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保存的斯坦因与日本人之间的往来通信外,肯定还有许多相关资料尚待发现,包括在日本保存着的斯坦因致日本人信的原件。譬如说,东京岩波书店于1927年出版矢吹庆辉著《三阶教之研究》一书时,在卷首照片上展示了矢吹庆辉保存的一些英国人写来的英文信,其中包括1917年12月3日斯坦因致矢吹庆辉信和1918年9月30日斯坦因致矢吹庆辉信,还有斯坦因至矢吹庆辉信函的4个信封。因有信封、信纸等相互遮拦的缘故,我们从这幅照片上不可能辨出信件的全貌。但可以肯定的是,刊布在照片上的这些信件只是矢吹庆辉保存的斯坦因来信的一些标本,而斯坦因写给矢吹庆辉的更多信的原件,以及他们之间更多的往来通信,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发现、搜集和整理。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1979年起开始对斯坦因的著作感兴趣,从1989年起开始搜集整理英藏斯坦因档案,到现在才开始陆续刊布,距离完成之日还遥遥无期。我从1991年起搜集日本敦煌学史研究资料,也陆续写出了《日本敦煌学史》的部分内容,但最终完成该书之日更是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既是我研究斯坦因的第一个阶段

成果，也是我研究日本敦煌学史的第一个阶段成果。我对斯坦因的研究和对日本敦煌学史的研究，还将缓慢地持续下去，这本书也只能算是我发表这两大课题研究成果的一个开端吧。说到底，日本的敦煌学史肯定还是由日本人来写为最好。在看到一部由日本人写出的比较全面的日本敦煌学史之前，染指这一课题的外人心里总忐忑不安的感觉，我更是不例外。我首先出版这本《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旨在将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中有关日本敦煌学史的部分梳理出来，算是拿出一些英文资料来壮壮胆子，但也真有抛砖引玉的愿望，希望能早日看到日本学者撰写的日本敦煌学史。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当我在研究日本敦煌学史的时候，所依据的日文资料主要是1991年至1992年在东洋文库搜集到的材料。由于那时条件的限制，大部分情况下我只能以手抄原文或现场翻译的方式搜集资料。由于我日语水平不高，以这种方法翻译的资料原文或手抄的研究笔记中，肯定存在着不少错误。本书虽然号称以英国藏斯坦因档案为主要研究对象，但终究还是要和日本敦煌学史挂起钩来，要引用很多日文资料。在我引用当时翻译或抄录的日文文献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错误，希望中外读者原谅。

本书所属的“国际敦煌学丛书”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确定的“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本书是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科研项目“英国藏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文献研究”的子课题成果。但是在本课题的资料搜集和前期研究工作中，我还获得过其他一些项目的帮助。尤其是在英国搜集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考古档案英文材料的工作，以及在日本搜集东洋文库藏日本敦煌学史日文材料的工作，分别得到过英国科学院王宽诚研究员基金项目“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第四次中亚考察研究”和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招聘研究员基金项目“敦煌及东突厥斯坦（新疆）出土文献的综合研究”的资助。对于支持我从事本课题研究的所有政府部门以及学术资助机构，我都深表感谢。